

建构当代民族精神的方法论思考

建构当代民族精神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所谓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在心理、意识、观念、习俗、规范、制度等方面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精神风貌、精神特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团结一致的精神凝聚力、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步的精神动力。一个民族的强大不仅要有科学、技术、生产所形成的物质力量上的强大，还需要有思想、精神、文化上的强大，因此民族精神的强弱程度是一个民族强弱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是精神上不自立的民族。因此，建构当代民族精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建设工程。

如何建构当代民族精神，有一个方法论思想的问题，能不能正确地、科学地、健康地建构当代民族精神取决于对民族精神的理解，而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又取决于对人、社会、民族、精神、思想的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理解。因此，建构当代民族精神的最根本的方法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被简单地用来作为推演有关结论的公式，它只能是我们研究建构当代民族精神时的指南。具体地说，当前建构当代民族精神的方法论思想要着重注意下列方面。

要倾听实践的呼声，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观点。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人们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还在于实践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根本存在方式、根本属性，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而已，人们之所以会结合成不同于其它动物群体的人类社会是为了从事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把人们联结为有机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存在形式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人们的心理、观念、精神及作为它们抽象的、形象的表现形式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也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它们的任务和使命是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服务，它们的命运也取决于实践的判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否认人们的目的、思想、精神、观念的社会本体论的存在，因为目的、思想、精神、观念在不同的人、社会那里虽然有发展程度上的种种区别，但根本没有目的、思想、精神、观念、文化的人和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人和社会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认为在说明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时不能从精神到精神、不能停留在目的、思想、精神、观念、文化的领域，而应该探求形成它们的物质的、实践的动因，主张从人们的劳动、实践中去揭示人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奥秘，认为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在人们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和发生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民族精神，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是在人们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也是为实践活动服务的。因此，我们只有从实践出发，研究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矛盾、问题、困难，研究人们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才能揭示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中华民族正在从事着什么样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这是我们讨论建构当代民族精神时需要抓住并回答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过光辉灿烂的业绩，直到公元十一世纪，我们中华民族在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都处在世界先进行列，但在近代落伍了。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中国人，从那以后，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了外御列强内行改革或革命以期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太平天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及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都是为了改变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1949年以后国民党在台湾所进行的建设和改革，其目的也是如此。尽管不同阶级、不同党派在政治上有着不同的、甚至对抗的路线和主张，但振兴中华则是共同的精神和目标，他们的活动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甚至他们之间的争斗都融汇为伟大的振兴中华的历史实践活动。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振兴中华仍然是海内外中国人从事各种实践活动时的主题，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开放，在本质上仍然是近代以来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实践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新阶段。近代历史上振兴中华的实践曾经造就了近代中华民族精神，当代振兴中华的实践也在呼唤着当代民族精神。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就是反映、顺应振兴中华的实践要求，推动这一实践的发展并保证振兴中华这一历史目标的彻底实现。

从事现代化建设当然需要资金、原料、设备等物质因素和条件，但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各种“物”都必须由人去创造，创造各种现代化的“物”的目的也还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的现代化及人活动的组织管理的各种规范和制度的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的前提和保证，只有人具备了现代化的精神才会去从事现代化的实践活动。如果人丧失了现代化精神，如果人沉溺于吃喝玩乐的享乐主义之中，如果人缺乏发展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雄心壮志和事业心，缺乏求实、刻苦、奋斗、开拓的精神和作风，那末实现现代化和振兴中华就只能仍然是一种梦。现代化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振兴中华也不可能由别人恩赐，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奋斗和拚搏，这就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当代中华民族精神。

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相关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开放实践。从过去中央集权的行政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表面上看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和方式上的改变，但实际上这种改变对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和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对人们的思想、生活、工作都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在我们既面临着转轨过程中的问题，也面临着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带来的问题，还面临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固有的负面影响所造成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利益驱动型的调节机制，但市场的发展史表明，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经营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有利于他人或社会的，仅有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放任只能形成和建立一种商人和强盗、骗子不分的市场，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市场，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文明的、规范的、法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体制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还应考虑他人的、集体的、社会的利益，要求市场主体具有文明的、规范的、守法的经营行为。因此在当代，无论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所建立的具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不是那种只讲经济利益不讲精神、文明、文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市场主体必须既具备经济人的品性又具有社会人、文化人的品性。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面临着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个人价值追求和社会价值追求、局部的近期的价值追求和全局的长远的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不同的人生观、价

价值观不同的精神会使人们作出不同的处置和选择。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也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素养提出了要求。只有认真研究这种要求，才能建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相一致、相适应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

二

要正确对待民族传统。

民族精神同民族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民族精神是现实中的民族传统，民族传统是历史地传递着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具有时代的历史的性质，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一方面总是深深地根植于该民族在该时代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总是从传统中汲取有用的成分，而当该时代成为历史的时候，该时代的民族精神又总是程度不等、形式不同地汇入到民族传统的长河中去。一个民族只要存在和发展，它就会不断地以新的民族精神去丰富它的民族传统，使民族传统不断得到丰富、更新和发展。因此，我们在建构当代民族精神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对民族传统的理解和把握的问题。

传统是每一代人在从事实践活动时所面临的先辈留传下来的历史遗产，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心理观念、习俗规范、制度体制等等。传统以其历史地形成的方式和原则制约着新一代人的活动的方方面面，接受传统意味着按照先辈们的“家法”、“规矩”、“方式”生活。传统总是意味着前辈和后辈之间的联系，前辈是过去、是历史，后辈是今天、是现实，因此传统就是过去和今天、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联，传统必须既具有历史的属性又具有现实的属性才能在历史和现实的辩证转化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延伸，失去了现实性，传统就会终止，就会变成纯粹是历史上的东西。如果每一代完全按前辈那样地生活，虽然传统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但它不过是一代又一代地重复，机械地重复着的传统实际上是传统的停滞，社会也就没有发展；如果每一代完全不按照前辈的方式生活即后辈与前辈之间不存在联系，那就意味着后辈与前辈之间的“断裂”，如果每代都与前辈“断裂”，那也不可能有传统的存在和发展。传统总是在后辈对前辈的又继承又变革即扬弃中得到发展的，传统是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

传统的命运取决于它对人们现实生活的意义。就极端情况而言，一般分为维护传统和反对传统这两种对立的态度，传统的命运就取决于不同态度的社会力量在思想上、理论上甚至政治上的争斗。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争斗经常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一般地说，被统治、被剥削阶级继承和发扬着反统治、反压迫、反剥削的造反、起义、革命的传统，统治、剥削的阶级则继承和发扬着统治、压迫、剥削的传统。围绕传统问题的争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局面。在社会矛盾激化尖锐的时期，在社会不变革不能存在和发展的革命时期，对传统进行批判、反对、变革的观点会受到普遍的支持和赞同，而为传统辩护的观点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当起义、造反、革命的社会力量获得夺取政权的胜利之后，胜利者一般都要破旧立新，用他们的新方式取代旧传统；在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处在稳定发展的和平时期，维护传统的观点又会受到普遍的支持，而反传统的观点则处于不利地位，整个社会的生活在传统的轨道上滑行。历史总是在矫枉过正的形式中曲折地发展，所谓矫枉过正就是对传统的矫枉过正。过是对正的偏离，只是在不断地矫的过程中才会逐渐地接近和符合正。因此在围绕传统的争论中，大方向正确的一方难免在局部或细节上发生错误，大方向错误的一方也不一定意味着在局部和细节上都错误，正是这种复杂情况决定了围绕传统的争斗总是一波未平一浪又起。最根本的还在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一个矛盾不断解决而又不断产生的过程。这样，随着社会生活的推移、随着人们面临新的社会矛盾，就会围绕维护还是变革传统发生新一轮的争论，因此围绕传统所发生的争论归根到底反映着传统和现实的矛盾。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同历史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现实需要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但现实又是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是对历史的一种超越，现实在超越历史的时候也就超越了传统。传统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现实的需要，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继承和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否定被变革，完全取决于传统和现实的矛盾程度。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对传统及围绕传统的争斗作出辩证的、历史的科学说明。

建构当代民族精神的题中之义就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从传统中发现和总结出民族精神，但“当代”的前缀词又告诉我们要站在当代社会实践的高度去看待民族传统、对民族传统作出符合当代要求的分析和总结。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创新生活、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曾领导人民群众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落后的、迷信的、封建的各种旧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扫荡，倡导和推广了革命队伍在革命年代形成的革命传统，确实曾经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但是后来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对待传统问题上也发生了“左”的、甚至极“左”的错误，不作分析地把传统一概斥之为“四旧”，用批判、斗争、焚烧、捣毁等极端的办法加以“彻底”的“破”，结果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纠正过去“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学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也开始了纠正过去在对待传统问题上的左的思想、理论、政策，对传统和过去对传统所进行的批判进行了重新评价。社会上则出现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向传统复归”的社会潮流，这种潮流的积极方面是进一步冲击了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新发掘、新评价；但这个潮流也出现了某些消极的方面，出现了传统不作分析而一概肯定的倾向，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层面上，特别在科学文化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和内陆或边远地区，各种愚昧、落后、封建的陈规陋习大量地、迅速地得到复活和蔓延。历史的经验表明，对传统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观点和态度都不可能帮助我们正确地从中提炼出民族精神，更不可能使我们正确地建构当代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有着漫长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我们在哲学、宗教、道德、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活斗争中铸就了许多优秀品质和社会风气，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抵御外敌的民族团结传统。当然，有些传统是在缺乏科学知识情况下形成的，明显地反映出愚昧无知的特点；有些传统则反映了农业社会在生产、经济、政治方面的历史局限性。显然，只有那些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俗、高尚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观念才是中华民族精神，至于那些愚昧的、落后的、封建的传统则并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因此，要建构当代民族精神，只能继承和发扬传统中的健康、文明、高尚的方面，如勤劳、勇敢、开拓、坚毅、谦虚、礼让等精神品质，尊老爱幼、尊师爱生、团结互助等社会风气，顾大体、识大局的全局观念、整体观念、系统观念，求实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民族团结、民族和睦的传统，等等。当代民族精神应该是历史传统中的民族精神在当代的继承和发扬。

三

要正确对待外国精神文化。

建构当代民族精神在肯定民族传统中的优秀的精神文化的同时，不应该重新提倡盲目排外的、封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历来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来起着分裂、消极、有时甚至是反动的作用，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正是由于不断反对和克服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才发展了平等、合作、团结的民族关系，才形成了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是各民族共同

创造的结果，因此同其他民族友好合作地交往、不断吸收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我们的祖先曾经克服地域阻隔上的种种困难，走出中华大地去发展同世界其它各民族的交往，曾经开辟了陆上、海上的各种“丝绸之路”。佛教曾经是一种外来文化，但我们祖先却接纳了这种文化并把它与儒学、道学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瓜分的同时仍然不断向西方各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孙中山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也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的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发源于欧洲，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实践过程中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它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历史的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善于学习其它民族的长处，总是推动和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而每当由于客观的或主观的原因，无法对外开放、无法学习和引进其它民族的优秀成果的时候，也往往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缓慢时期。开放就进步，封闭就落后，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当今世界在科学技术革命、特别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地、各民族、各国家日益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经济、科技、政治甚至文化上的世界化、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整个人类越来越在世界范围内被组织、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各民族彼此开放、学习、互相取长补短更成了当今各国各民族关系上的主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谁善于向其它民族学习、善于吸收和利用其它民族所创造的积极成果，谁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即使目前处于不发达状况，也可以通过向发达国家的开放、学习、引进，避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各种曲折、付出的各种代价，可以形成自己的后发优势。加快自己的发展进程。

向外国民族学习，不应该盲目的崇洋媚外，不应该不作分析地、不分良莠地一概照抄照搬，不应该“食洋不化”，而应该分析、消化并同自己的传统结合起来。发展自己的时代特色。应该看到，发达国家的文化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现代和过去之分。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工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许多思想、观念、理论在目前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能适应当代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需要，不仅不能有利于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和矛盾的解决，甚至它们本身就是当代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得以形成和出现的思想理论根源。西方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理论家在批判地反思近代乃至更为久远的古代的各种思想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使得西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统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过去曾处于支配地位的科学主义思潮正和人文主义思潮彼此渗透结合起来；过去流行的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潮正在为人、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潮所取代；过去强调主客体区分的思潮正在演变为主客体统一的思潮；以分析为主的思潮正在走向以综合为主的思潮；过去人们在科学认识领域主张排除偶然性、主张从变化、多样、复杂的现象世界进入不变的、单一的、内在的本质和规律世界，现在则觉得应该回到多样性、复杂性、现实性，回到现实世界；过去人们主张原子论、机械论，现在则主张系统论、有机论、整体论；过去人们注意实体，现在则把注意力转向关系、过程、信息；个体至上、个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曾经在西方价值观中占有核心的支配地位，现在这种地位在动摇，正在被对他人、社会甚至生态环境要承担更多责任、义务的观念所取代。某些学者甚至认为反映工业社会的现代主义正在被反映未来信息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所取代。大概由于我国当前发生的变化是一种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人们非常需要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上的各种思想和观念，于是过去在西方流行而目前在西方受到责难的那些思想、理论反而在中国大陆上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某些人“饥不择食”地盲目崇拜、照抄照搬，全然忘记了那些思潮的各种局限性，甚至用它们来反对和取代传统文化。十分明显，这种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态度不可能引导人们正确地建构当代民族精神，只能引导人们走向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自卑主义。实际上，当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治理工业发达国家社会病的价值。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一概排斥西方文化，我们有我们的弱点和问题。只要我们对西方文化抱清醒的、分析的态度，那末有条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合理的方面，对于纠正和克服过去在中央集权行政体制下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还是很有好处的，会有利于现代化的实现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应该承认中华民族文化和外民族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区别，但不应该将这种差异、区别夸大到彼此不能相容的地步，不应该借口差异、区别去绝对地肯定一方和绝对地否定另一方。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化自有它们存在的各自实践上、时代上、传统上的根据，也自有它们在文化空间上的稳定性，但任何民族的文化不论有怎样悠久的传统和顽强的生命力、张力，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和弱点，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世界性的今天，这种局限性和弱点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人们活动的全球性和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局限性的矛盾推动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互补。此外，随着工业化的生产力向信息化自动化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发展自己的精神文化空间，追求着更加丰富多采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在科学、技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精神上、文化上反而主张多样性、多元性的原因。在今天，越是具有民族性的精神文化越会得到他民族、他国家、他地区的欢迎。可以说，在文化上利用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是当今时代的一种潮流。在这种潮流面前，我们越是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上善于学习、吸收、引进其它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时代精神文化，就越是会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重视，我们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就会更大，我们发展民族文化的路子会更加宽广，在世界舞台上会有更强的适应和竞争能力。

总之，以实践为基础，正确对待传统优秀文化，正确对待外国文化，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外国文化中的精华，再加上我们的创新和开拓，这就是建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正确道路。

(原刊载于《浙江学刊》1995年第5期)